

徐净植
为全面从严治党
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 6版·论苑

权衡 李伟 张雪魁
构建新时代中国
高质量发展叙事体系

→ 7版·智库

余明锋
今天如何打开
康德的遗产

→ 8版·学人

学术圆桌

承担大国责任、展现大国担当，共建地球命运共同体

让绿色成为美丽中国的最鲜亮底色

■主持人：任思蕴 本报记者
■嘉宾：宋蕾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经济与政研部教授
周冯琦 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韩旭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讲师

编者按 4月22日是第55个世界地球日。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深怀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加快绿色化、低碳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新征程上，如何更高水平地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塑造新优势，为全球可持续发展事业注入更大动力，本报邀请三位专家学者研讨交流。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鹤主要栖息在海拔2500米至5000米的高原、草甸、沼泽地带。近年来西藏黑颈鹤数量从20世纪不足3000只增至万余只。新华社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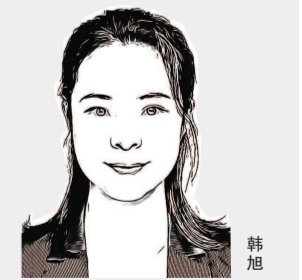
观点



“美丽中国建设为新质生产力培育设定宏伟的目标。绿色低碳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特征，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在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关注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和社会公平等问题，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强劲科技动力。美丽中国建设将激活更多更优质的新质生产力。”



“中国立足国情，积极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一是探索可持续绿色增长。二是探索普惠性生态福祉。三是探索可持续资源配置。四是探索生态经济共同体。中国在参与共建地球命运共同体实践中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作为和担当。首先是中国自身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不仅造福中国，也为共建地球命运共同体提供宝贵经验。同时不断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注入中国动力。”



“我国各地已涌现出一大批将生态优势转化成发展优势的案例，转化路径成果和模式进入密集推出期。不同地区因地制宜的探索应注意以下几方面：在质量上，以生态化提升质量；在主体上，以多元化提高效率；在治理上，以精准化促进协调；在方法上，以数字化实现共享。”

主持人：在2023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总结了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成就，其一为“紧跟时代、放眼世界，承担大国责任，展现大国担当，实现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中国积极参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在理论和现实层面有哪些重要贡献？

周冯琦：中国立足国情，积极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一是探索可持续绿色增长。坚持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辩证统一，尊重、顺应和保护自然，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同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有机结合起来，为解决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有机统一、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二是探索可持续资源配置。强调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规模，注重解决资源要素分配过程中的公平问题，探索资源配置的多元方式。四是探索生态经济共同体。提出“命运共同体”“区域生态绿色一体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破解跨区域生态经济问题及逆全球化导致的全球生态公共产品供给赤字问题。

中国参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实践中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作为和担当。首先是中国自身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十八大以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多个世界之最：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全球能效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全球利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国。中国的生态治理成就不仅造福中国，也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提供宝贵经验。同时不断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注入中国动力。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推动《巴黎协定》的达成、签署、生效和实施，成功举办生物多样性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第一阶段会议，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支持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推进可持续发展合作平台，在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中作出中国贡献。

宋蕾：理论层面，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两山”理论是绿色发展理念的核心要义，揭示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之间存在共同价值创造的逻辑关系。这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协同推进的重大理论创新。同时，我们坚持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推进目标评价考核制、河湖长制“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等，都充分体现中国的体制和制度优势，增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合力。这种领导方式超越了西方环境理论常见的政府、企业、公众主体三分法，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坚强政治保障。

从现实层面看，经过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我国生态环境显著改善，PM2.5浓度下降，地表水质改善，固体废物实现“零进口”目标。我国已在多个方面达到世界之“最”：是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最快、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是在世界上率

先实现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面积“双减少”的国家，是全球能效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我国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和在核电装机容量居世界第一，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

韩旭：在“两个大局”加速演进并深度互动的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为破解当前人类发展面临的困境、解决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揭示了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新路径；“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不可分割的生态系统”，明确了生态治理的系统观、全局观。习近平总书记就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凝聚了生态治理的国际共识，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共赢、世界各国共同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中国的绿色发展扩大了全球绿色版图。坚持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超额完成2020年碳达峰目标；持续提升绿色低碳制造能力，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太阳能电池“新三样”出口成绩亮眼；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积极稳妥推进“双碳”目标，有力推进全球减碳进程；落实全球可持续发展倡议，推动发展成果和良好生态惠及发展中国家。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中国行动是具有实效性、引领性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贡献者和引领者。

主持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加快绿色低碳化、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新质生产力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有巨大空间和潜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如何科学把握新质生产力培育和美丽中国建设之间的关系，促进二者之间的同频共振？

周冯琦：一方面，以发展新质生产力赋能美丽中国建设。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培育新质生产力，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培育和壮大新质生产力有利于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另一方面，以美丽中国建设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就是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等重大论断，创造性地将自然生态资源、环境要素纳入生产力范畴，拓展了劳动价值论的生态维度，从人与自然协同进化的角度提出绿色发展理论，实现了发展观的深刻变革。深入推进美丽中国建设，能够不断加大土地、森林、河流、矿产等生产要素投入，不断促进资源环境要素积累，实现资源环境要素优化配置，提升资源环境要素利用效率，培育壮大绿色生产力。

主持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今年全国各地入春以来，“踏春”赏花等绿色文旅消费火爆，展现了美丽中国的经济活力。文旅消费市场的日趋多元和兴旺，离不开美丽中国建设的生态供给。未来如何更好地统筹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地制宜将生态优势不断转化成发展优势？

韩旭：我国各地已涌现出一大批将生态优势转化成发展优势的案例，转化路径成果和模式进入密集推出期。不同地区因

地制宜的探索应注意以下几方面：在质量上，以生态化提升质量；在主体上，以多元化提高效率；在治理上，以精准化促进协调；在方法上，以数字化实现共享。

宋蕾：一是大力推进产业生态化，通过实施分区差异化精准管控的环境管理和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提升生态产品可持续供给的生态基础。二是以宜居、宜业、宜游、宜养为目标，因地制宜推进地方生态产业化，依托自然风光、历史文化资源，在最大限度减少人为扰动前提下，开展旅游与康养休闲融合发展的生态旅游项目建设。三是不断挖掘新的生态资源要素，促进生态资源要素和其他生产要素结合，探索多产业协同的新模式和新业态。不少地方已探索出“古村落+”“文旅+”“数字+”等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

周冯琦：利用生态优势培育消费新动能，落脚点是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首先，要不断深化对生态产品的认识。从供给角度来看，生态产品与普通商品最大的区别在于其供给依赖于自然生态，既包括完全由生态系统提供的调节、支撑服务等自然生态产品，也包括人类利用生态系统的属性或要素所生产的城市生态空间、绿色基础设施、农产品等准自然生态产品，又包括人类劳动创造的生态修复地、人工林、生态工业品等劳动生态产品。各地可以结合资源禀赋和生态优势，因地制宜开发生态产品。其次，持续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发掘和打造独特的生态地标，塑造特色形象和文化品牌，建立生态产品品牌培育、产品认证和质量追溯机制，促进生态资产持续增值。发挥政府、企业、市场等多元主体作用，因地制宜选择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生态权益交易、生态权益资本化、绿色标识、绿色认证、生态产业化、生态补偿等价值实现路径，为附着于产品和服务的自然资本价值显性化创造条件，让生态优势不断转化成发展优势。

宋蕾：一是大力推进产业生态化，通过实施分区差异化精准管控的环境管理和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提升生态产品可持续供给的生态基础。二是以宜居、宜业、宜游、宜养为目标，因地制宜推进地方生态产业化，依托自然风光、历史文化资源，在最大限度减少人为扰动前提下，开展旅游与康养休闲融合发展的生态旅游项目建设。三是不断挖掘新的生态资源要素，促进生态资源要素和其他生产要素结合，探索多产业协同的新模式和新业态。不少地方已探索出“古村落+”“文旅+”“数字+”等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

周冯琦：利用生态优势培育消费新动能，落脚点是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首先，要不断深化对生态产品的认识。从供给角度来看，生态产品与普通商品最大的区别在于其供给依赖于自然生态，既包括完全由生态系统提供的调节、支撑服务等自然生态产品，也包括人类利用生态系统的属性或要素所生产的城市生态空间、绿色基础设施、农产品等准自然生态产品，又包括人类劳动创造的生态修复地、人工林、生态工业品等劳动生态产品。各地可以结合资源禀赋和生态优势，因地制宜开发生态产品。其次，持续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发掘和打造独特的生态地标，塑造特色形象和文化品牌，建立生态产品品牌培育、产品认证和质量追溯机制，促进生态资产持续增值。发挥政府、企业、市场等多元主体作用，因地制宜选择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生态权益交易、生态权益资本化、绿色标识、绿色认证、生态产业化、生态补偿等价值实现路径，为附着于产品和服务的自然资本价值显性化创造条件，让生态优势不断转化成发展优势。

宋蕾：一是大力推进产业生态化，通过实施分区差异化精准管控的环境管理和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提升生态产品可持续供给的生态基础。二是以宜居、宜业、宜游、宜养为目标，因地制宜推进地方生态产业化，依托自然风光、历史文化资源，在最大限度减少人为扰动前提下，开展旅游与康养休闲融合发展的生态旅游项目建设。三是不断挖掘新的生态资源要素，促进生态资源要素和其他生产要素结合，探索多产业协同的新模式和新业态。不少地方已探索出“古村落+”“文旅+”“数字+”等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

周冯琦：利用生态优势培育消费新动能，落脚点是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首先，要不断深化对生态产品的认识。从供给角度来看，生态产品与普通商品最大的区别在于其供给依赖于自然生态，既包括完全由生态系统提供的调节、支撑服务等自然生态产品，也包括人类利用生态系统的属性或要素所生产的城市生态空间、绿色基础设施、农产品等准自然生态产品，又包括人类劳动创造的生态修复地、人工林、生态工业品等劳动生态产品。各地可以结合资源禀赋和生态优势，因地制宜开发生态产品。其次，持续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发掘和打造独特的生态地标，塑造特色形象和文化品牌，建立生态产品品牌培育、产品认证和质量追溯机制，促进生态资产持续增值。发挥政府、企业、市场等多元主体作用，因地制宜选择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生态权益交易、生态权益资本化、绿色标识、绿色认证、生态产业化、生态补偿等价值实现路径，为附着于产品和服务的自然资本价值显性化创造条件，让生态优势不断转化成发展优势。

宋蕾：一是大力推进产业生态化，通过实施分区差异化精准管控的环境管理和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提升生态产品可持续供给的生态基础。二是以宜居、宜业、宜游、宜养为目标，因地制宜推进地方生态产业化，依托自然风光、历史文化资源，在最大限度减少人为扰动前提下，开展旅游与康养休闲融合发展的生态旅游项目建设。三是不断挖掘新的生态资源要素，促进生态资源要素和其他生产要素结合，探索多产业协同的新模式和新业态。不少地方已探索出“古村落+”“文旅+”“数字+”等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

周冯琦：利用生态优势培育消费新动能，落脚点是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首先，要不断深化对生态产品的认识。从供给角度来看，生态产品与普通商品最大的区别在于其供给依赖于自然生态，既包括完全由生态系统提供的调节、支撑服务等自然生态产品，也包括人类利用生态系统的属性或要素所生产的城市生态空间、绿色基础设施、农产品等准自然生态产品，又包括人类劳动创造的生态修复地、人工林、生态工业品等劳动生态产品。各地可以结合资源禀赋和生态优势，因地制宜开发生态产品。其次，持续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发掘和打造独特的生态地标，塑造特色形象和文化品牌，建立生态产品品牌培育、产品认证和质量追溯机制，促进生态资产持续增值。发挥政府、企业、市场等多元主体作用，因地制宜选择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生态权益交易、生态权益资本化、绿色标识、绿色认证、生态产业化、生态补偿等价值实现路径，为附着于产品和服务的自然资本价值显性化创造条件，让生态优势不断转化成发展优势。